

上海的四季孵化了上海式的分寸，上海的民宅梳理了上海式的分寸。

以淮海中路和南京西路为两条主轴，好几条马路两边，集中地矗立几十幢老式公寓房子，大多已经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了，现在依然是沿街的建筑和人文风景。

所谓公寓，是每一个楼层有若干套独门独户的住家。除了在楼道上相逢一笑，便走进自己家里，和邻居绝少往来，更无过从亲密。

新式里弄房子也是独门独户煤卫设备独立的体例。至于石库门，不必看它最出名的“七十二家房客”簇拥，石库门的最初居住模式，是一个门牌号一家人家的“联体别墅”，只有殷实人家才住得进去。

北方则不同。北方是大院式的，到了北

京，以四合院为代表，是将户与户人与人拢在一起，几户人家合在一个大院里，最善于表达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传统，恰是四合院，而不是上海的老式公寓，老式公寓里最合适的，是孤独的陈白露拉开窗帘看日出。

我将上海以公寓房子为代表的邻居人际关系称为“树杈模式”。走进一条弄堂，像是源

树杈模式的人际关系

上海分寸系列(之二)

马尚龙

于同一棵树，而后又转入自家的小弄堂，自家的楼，沿楼梯进了独门独户的家里，像是归宿于各自不同的树杈上，树杈模式的邻居人际关系，是疏离，是分众。

我将四合院的邻居人际关系称为“谷场模式”，在同一个谷场不分彼此，虽然也是有各自的家，但是庭院便是谷场的中心。谷场模式的邻居人际关系，是围拢，是合众。

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理念，上海人之所以做不到北方人那样善于合伙拉帮结派，在各自迥然不同的居住模式中，已经冥冥而定了。

树杈模式分众居住的公众空间，比谷场

模式合众居住小得多，但是个体空间反而大了，有更多的个体想象和个体努力的自由。

按照美国人类学博士爱德华·霍尔的观点来说，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不越界，既是对亲属关系的尊重，也是一种分寸感的体现。

2020年刚去世的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，或许也是经历过和中国人相仿的社会生活，对“边界”看得很重很极端：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，都缘于缺乏边界感。这个边界感，也就是中国人的分寸了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上海人的分寸就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。公寓房子是有边界感的，如今写字楼里办公桌之间的隔断，也恰是边界一般，可以看作是树杈模式的人际空间。

树杈模式，因为分众而更需要自我能力的完善，要有足够的自我保护，要和外界对方保持有安全感的距离。所以，和上海人结交朋友，远不如和北方人交朋友来得爽快。

住在公寓房子里的人，文质彬彬，见了面微微一笑，各进各的门。公寓房子里的人很少有包了馄饨一家家人家去敲门分享，人与人之间是不热的；当然也绝少吵来吵去，人与人之间是不烫的。树杈的间离效应发生了作用。

大羊村是生我养我的西北农村。

我一九四七年正月二十二生于陕西省长安县（现为西安市长安区）细柳区大羊村。父亲叫姚连鹏，母亲叫王秀云。1929年，母亲和她弟弟从渭河以北的农村逃难到长安。后来我舅舅逃到甘肃敦煌一带村庄。2005年我在敦煌开会，利用会议间隙，去找舅舅当年落脚的村子。当地老百姓告知：因为风沙灾害，那个村庄早就分散搬迁了。

在刚入读细柳中学时，我在夜晚参加过村上的业余剧团，曾模仿着编写了一折秦腔《姐弟泪》，是我母亲、舅舅逃难为原型的故事。我演弟弟，村上一年轻媳妇演姐姐，现在想来这是我最早的习作。

我6周岁那年，母亲生了重病。那天夜里，她让我睡在身边，待我醒来时，发现我枕在妈妈的胳膊上，而妈妈再也喊不醒了，妈妈走了，永远走了！

母亲去世后，我和父亲相依为命艰难地度过9年光阴。就在初中二年级历史期末考试时，村上上一位好心人报信说：“你父亲病重，快回去吧！”我报告回家后立即停止上课，赶回家中。当时村上的人已帮父亲剃了头（农村人临终前的一种仪式），我强忍着泪水，背着父亲在后院大哭。

父亲给我留下的遗言是“再苦也要坚持读书”。

父亲走后，我一个人孤苦地生活，在夜里常常不敢入睡，睡梦中全是爸爸、妈妈的身影。一天夜里，睡到半夜，我突然听到炕下有动静，拉灯一看，有两条近1米长的蛇。我惊吓得将窗框拉断跳了出去。村上老人说：“那是你爸爸妈妈回来看你了啊！”长辈的这句话

写给故乡

姚华飞

使我与蛇有了特殊的感情。而我和蛇的几次相遇也很奇特。

1966年3月，我刚从新兵连军训结束，就到云南祥云山区轮战，在站岗的第一晚，看到雷达车旁一棵树上有什么在动，月光下仔细看去，原来树上有条1米多长的蛇。1985年2月新春佳节之际，我奉命到广西前线参加自卫反击战，到龙州板塘阵地时已是中午，当我和战友从车上下来时，在阵地边草丛中又看到一条深绿色的蛇。

从那次在家中夜里看到蛇后，我再也不敢单独在家里睡觉了。随后就搬到小羊村初小和老师姚振立一起住。然而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一个星期天下午，等我饭后去学校休息时，我自己的一床被子被人偷走了。没办法，我将褥子改成被子。因为只有一条褥子改，太冷，在学校不能住了，就到村上养牲口的饲养室睡觉。冬天时，常帮姚振立大爷喂好炕，再在灯下看书做作业，伴随着牛马吃草声入睡。

在我读书时，班主任胡志恒老师，还有教物理课的王崇智老师时常送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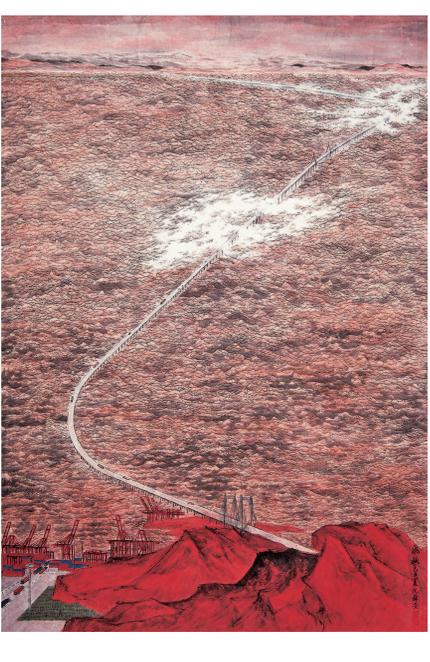
我2-3元钱，让我零用或买些书本和日用品。我在饥寒交迫中读完了初中课程，还没有来得及拿文凭，就赶到西安考工，成为陕西省建筑二公司一名挖土方工人。我拿到第一份工资那天，正值榆林地区遭水灾，我将工钱的一半15元，通过团组织捐给灾区读书的孩子。第二年我应征入伍，走上了新的征程。

当兵期间，我曾回故乡探亲一次。那时，我原来的住房，一半是生产队的农具室，一半住着一位孤寡老人……

又要分手啦！我在先辈留下的古柏树边转了几圈，看见树洞里的蜜蜂

勤快地酿着蜜；站在老爷爷庙台上，极目向终南山望去，山连着山，满眼葱绿，生机勃勃。村西头的一位大婆听说我可能要上前线，提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要我带上，含着眼泪说：“下次回来可能就看不到大婆了。放心走吧！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……”我泪如泉涌，说不出话来！

近日，同村和我同年入伍的战友王余显从家乡发来微信说：“我们小时候在困苦中长大，但大羊村终究抚养了我们。”同年入伍的雷达站战友、著名书法家张西前发来又火又美的西安视频，使我想接千里、夜不能寐，写下此文，给我再也回不去的故乡。



飞跃

(设色纸本)

沈舜安

声声慢·春晓登黄山

(昆补之体)

何伟毅

奇涵众岳，韵漫三春，海涯墨客魂牵。旭日流霞霞采，造邀云天。登临清风拂面，洗俗身、似出尘寰。石径上、忆前生曾遇，即此真仙。

丽色敞怀俱揽，激湍漪、平添逸兴翩翩。策杖寻幽探妙，泻瀑鸣泉。松涛操琴岫壑，伴莺啼、鹤啸遥传。畅游了、便休言看岳，亦不看山。

注：明朝旅行家徐霞客登临黄山时赞叹：“薄海内外之名山，无如徽之黄山。登黄山，天下无山，观止矣！”被后人引申为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”。

“我无法正视电视画面，海啸一路卷着瓦砾和海水，浊流一般吞没了房屋、农田和道路。浪头压过正在行驶的汽车，谁坐在里面？父亲、母亲还是兄弟姐妹？——和某人紧密相连，无可替代的生命被吞没了……”

日本3·11地震次日《朝日新闻》的“天声人语”版，至今仍躺在我的剪报夹里。记得某位同事看了报纸后叹息道：“这样的文章简直不需要文采和技巧，只需白描就够了，三言两语就能催下人的眼泪。”

地震当天我在爱知县，在剧烈的摇晃之后打开电视，错愕地发现画面也在摇动，浊浪滔天、直扑天空的黑烟和火焰，东京新宿车站前惶恐的人流，几乎是电影《2012》的翻版。

几天后友人打电话来约我见面，之前我在她那里订的一幅日语假名的小斗方到了。斗方上写的是《万叶集》里的诗句，大意是吉祥美事如同初春的雪一般纷纷降临。大灾之后的日子，读到这样的句子分外让人感慨。朋友开玻璃器皿店，可以想象地震时一屋子的玻璃器皿叮当作响的情景。我问她当时是否害怕，她说：“我只是把店门打开，做好跑出去的准备而已。”

那年的3月14日，一向把欧美节日当作重要节庆认真操办的日本，货架上闪着金光的礼盒巧克力几乎无人问津。而一个月前2月14日那天娱乐节目的女嘉宾们，当众表演学做巧克力蛋糕，眯眼吮指娇笑不已。我忽然怀念当初觉得无聊浅薄的节目。要深刻做什么呢？如果深刻必须以灾难作代价。声色犬马多好啊，就像一个原本大大咧咧、没心没肺的人，就该长久地开心下去，一旦他细致、隐忍起来，其中的变故和成长之痛真是不堪细想。曾经以为有千百种定义的“幸福”变得简单，就是有水有电有煤气。邮箱里堆满了国内友人的信件。问候的话语无论是出自情感还是教养都一样可敬。

今年2月，我偶然看到一位旅居日本的中国作家的微博，说一位在东京银座四丁目街口站了十年，为3·11地震灾区诵经祈福的托钵僧，因感染新冠去世了。这位曾在纽约组过乐队，憧憬当一名音乐人的东京男子，中年时去高野山修行后出了家。他于2010年8月开始托钵修行，地震后时常去灾区，在东京时便在街角诵经，时常有人来向他倾诉烦恼。去年四月，东京宣布了疫情紧急事态之后，他仍坚持站在街头。这位名叫望月崇英的僧人，我在微博图片里看到了他在街道转角处托钵的身影，去世后满地的花束，还有一张报纸上的照片，摄于地震一周年的仙台，他穿着僧袍站在雪地里，面朝太平洋，背影笔直坚定。“这个世界上固然有作秀的人，也同样有真诚走路的人，看他们的背影你就能知道……真挚地祝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少了一个。这个地球重量，就悄悄地，比一粒灰尘更轻地，轻了一点儿。那么我今天愿意为地球祝愿一会儿，希望地球今天能睡个好觉。”那位作家如此写道。让我们在无常面前不致动摇的，就是这些自尊、慈悲，温柔地为这个世界缝补伤口的人吧。

今年2月，我偶然看到一位旅居日本的中国作家的微博，说一位在东京银座四丁目街口站了十年，为3·11地震灾区诵经祈福的托钵僧，因感染新冠去世了。这位曾在纽约组过乐队，憧憬当一名音乐人的东京男子，中年时去高野山修行后出了家。他于2010年8月开始托钵修行，地震后时常去灾区，在东京时便在街角诵经，时常有人来向他倾诉烦恼。去年四月，东京宣布了疫情紧急事态之后，他仍坚持站在街头。这位名叫望月崇英的僧人，我在微博图片里看到了他在街道转角处托钵的身影，去世后满地的花束，还有一张报纸上的照片，摄于地震一周年的仙台，他穿着僧袍站在雪地里，面朝太平洋，背影笔直坚定。“这个世界上固然有作秀的人，也同样有真诚走路的人，看他们的背影你就能知道……真挚地祝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少了一个。这个地球重量，就悄悄地，比一粒灰尘更轻地，轻了一点儿。那么我今天愿意为地球祝愿一会儿，希望地球今天能睡个好觉。”那位作家如此写道。让我们在无常面前不致动摇的，就是这些自尊、慈悲，温柔地为这个世界缝补伤口的人吧。



呼我以马在天为龙

(篆刻) 徐兵

浦南濒海，河汉丛错，地卑湿而多蛇。惊蛰雷动，蛇出洞。农人田间劳作，自暮及秋，时有伤死。蛇医由是生焉。蛇医属中医，然较之建府开业的中医，其地位卑下，类似治跌打损伤的江湖郎中。然其必有看家绝活，故享誉一域。我乡曾有蛇医“老干”，住胡桥镇，是公社的植保干部。平日常见他在田野里兜转，看庄稼病虫害。然使之驰誉浦南的，则是其医蛇咬。老干人瘦小，驼背且吊眼皮。我正看连环画的年龄，觉得他像《三国演义》中献西川图给刘皇叔的那个张松。非一般之相的人必有异禀。

老干当值于田间，腋下掖一个白铁皮喇叭。见病虫害，则于十字路口站立，举喇叭喊：有红铃虫喽！有蚜虫、稻飞虱喽。提醒防治。余下的时候，背着手沿着浜滩和茅草路走，那多半在观察蛇情。那时乡间，多的是乌青梢蛇、水蛇、金环蛇、银环蛇、四脚蛇，这类蛇毒性小，遭咬后一般无碍。而剧毒的有眼镜蛇、土虺蛇。这两种蛇呈土灰色，头似箭镞般，

行踪诡异。若十天半载不雨，其又久久旱地，则毒无比。那时乡下无蛇毒血清，被咬后稍有耽擱，基本无救。若见市河内一条农船飞快地摇着橹，直奔老干家的水桥，那一定是有人遭蛇咬了。是否有救？得看运气。那时没手机，老干出门，行踪不定，那遭咬的人命悬一线。但这个季节，老干一般不会整天不回来。有好几次，被咬的人瞳孔都有些放大了，还是被老干救了过来。那多半是耽擱了时间，或者是被卫生院回绝的。老干治蛇咬，只需两次就好，再严重也就三次。他用的药，不管是吞服还是敷药，都是自己用土方配制。据说里面有眼镜蛇、土虺蛇的毒液，还有麝香、蟾蜍酥加草药。蛇咬往往在四肢，卫生院则是扎住被咬一股，然后放血。可收效甚微。然医院认为老干没行医证，不合法。可患者依然奔至老干门前。于是有关部

门出面，要求老干献出秘方。老干无奈献出。卫生院虽以此方如法炮制，但疗效不及。老干的蛇医缘，还有个故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老干家来了走江湖的房客，卖膏药为生。一天，他卧病不起，久之，付不起房租。老干家供食宿依旧。那房客感到将不久于人世，就对东家说：你们干家慈义。我身无分文，传薄技为报！于是在病榻上将治疗蛇咬的秘方、草药的采制等传授给弱冠的老干，并嘱咐他，蛇咬的一般都是劳苦大众，你要善待农民。他将残存的各种药写上标签，一一告诉老干该怎么使用。成年后，老干记着师父临终嘱托，喜欢上捕蛇，割蛇毒，采草药。为了验证药的功效，他尝试着让蛇咬，然后自己医治。几次遇险，可治愈后获得了经验。从此，他开始了漫长的行医生涯。

江湖蛇医

汤朔梅

老干治蛇咬从未失手。他遇困难者，总无偿。口碑日隆。上了年纪的他，公职退休。可到春夏季，还拿着一个袋子沿茅草路捕蛇。方圆十几公里，无人不识老干。看到他，总延请他坐坐喝茶，或者留饭。他从不吃请，至多坐下来喝茶。每遇到说起家人曾受惠于他，而一脸感激时，老干瘦小的脸上皱纹特别舒展。

他也曾经收过几个徒弟，可都没得真传。去年冬，在朋友的饭桌上遇到干姓后生。询之，老干孙也！方知老干已作古二十余年。再问其医技传承，答曰无之。我不禁叹惋：这医技的形成，该几世几代呢？一旦失之，岂止可惜？再想想，失传的何止是蛇医呢！

十日谈

包装是日常的一部分。包装与拆包装除了力气还要手巧。明起请看一组《包装这细活》。

责编：杨晓晖

